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刊物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SSCI) 来源集刊



# 藏学 学刊

བོད་རིག་པའི་དུས་དབང།

JOURNAL OF  
TIBETOLOGY

总第 25 辑

2021 (2)

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 编



中国藏学出版社

བོད་རིག་པའི་རྩལ་དེབ།  
藏 学 学 刊  
Journal of Tibetology

**主编** 霍巍 石硕  
**常务副主编** 张长虹

**编辑委员会**

(以姓氏拼音为序)

**主席** 巴桑旺堆 (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

**委员** 才让太 (中央民族大学)

霍 巍 (四川大学)

石 硕 (四川大学)

沈卫荣 (清华大学)

熊文彬 (四川大学)

张 云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

多吉旺秋 (德国汉堡大学)

范德康 (美国哈佛大学)

马休·凯普斯坦 (法国巴黎高等研究实践学院、  
美国芝加哥大学)

滕华睿 (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

谢 萧 (法国巴黎高等研究实践学院)

**编辑** 陈 波 嘎尔让 华青道尔杰 (张延清)

许渊钦 杨清凡 玉珠措姆 (金红梅)

张长虹

**编务** 孙昭亮

བོད་རིག་པའི་རྒྱུ་རྗེ  
藏 学 学 刊  
Journal of Tibetology

**Editors-in-chief** Huo Wei, Shi Shuo  
**Deputy Editor-in-chief** Zhang Changhong

**Editorial Board** Pasang Wangdu (*Chair, Tibeta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China*)  
Tsering Thar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Huo Wei (*Sichuan University, China*)  
Shi Shuo (*Sichuan University, China*)  
Shen Weirong (*Tsinghua University, China*)  
Xiong Wenbin (*Sichuan University, China*)  
Zhang Yun (*China Tibetology Research Center*)

Dorji Wangchuk (*Hamburg University, Germany*)  
van der Kuijp, Leonard W. J. (*Harvard University, U.S.A.*)  
Kapstein, Matthew T. (*É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 France; University of Chicago, U.S.A.*)  
Tuttle, Gray (*Columbia University, U.S.A.*)  
Scherrer-Schaub, Cristina A. (*É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 France*)

**Editors** Chen Bo, Gaerrang,  
Pelchan Dorje (*Zhang Yanqing*),  
Xu Yuanqin, Yang Qingfan,  
Yudru Tsomu (*Jin Hongmei*), Zhang Changhong

**Editorial Assistant** Sun Zhaoliang

# 清代西藏八思巴字印章初探\*

朱德涛

**内容摘要：**八思巴字印章是清朝西藏地方官印中非常盛行的一种印章类型。对这类印章的印文释读、性质特点与历史涵意，学界尚存一些隔膜和误区，缺乏系统深入研究。文章结合文物、档案及文献资料对清朝西藏官方使用过的八思巴字印章的印面文字、形制特点、功能使用和出现原因等问题进行考证和分析后认为，八思巴字印章不属于清朝中央政府颁授西藏的印信体系，而是西藏地方上的自制印章，它被西藏的僧俗人员广泛使用于西藏地方的政教事务之中。八思巴字印章之所以在清代西藏地方上盛行，是由清廷默认支持的官方态度、当时西藏地方特殊的政治形势及其历史传统等多元因素相结合的产物。对以上问题的探讨将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和认识清代西藏地方上的官印制度及其政治特点，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研究意义。

## 一、引言

八思巴字是元朝至元六年（1269年）元世祖忽必烈诏命萨迦派高僧八思巴依照藏文

---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西藏古代印章与汉藏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21CMZ045）的阶段性成果。

创制的文字，当时这种文字被称作“蒙古新字”。按照当时官方的诏书，这种文字作为“译写一切文字”的“国书”，主要用于国家颁发诏旨、文告、法令和官印等<sup>1</sup>。但从现存资料来看，八思巴字在元代并非真的用于译写一切文字，而是主要用在译写汉字、蒙古文字和少量藏文<sup>2</sup>，该文字的这种功能和使用范围也很快随着元朝的灭亡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明朝后期以来，在我国蒙藏地区的一些藏传佛教寺院里，一直流行着一种以八思巴字译写藏文的文字，主要用于印章、楹联、匾额、经卷封面等。目前学界关于这种文字的定名尚有一定分歧，归纳说来，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这种文字是藏文的一种篆体形式，如王尧称其为“篆体藏文”<sup>3</sup>，松儒布称它为“八思巴字篆体藏文”<sup>4</sup>。第二种观点倾向于认为这种文字是八思巴字，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如陈庆英<sup>5</sup>、欧朝贵<sup>6</sup>和其他部分蒙古族学者<sup>7</sup>。第三种观点比较持中，认为这种文字是以八思巴字为基础衍生出来的一种新型文字，最主要的学者代表是八思巴字专家照那斯图，他认为该文字是“一种从八思巴字脱胎而来的文字”<sup>8</sup>。

综合上述三种观点，笔者认为这种文字应当被称作八思巴字。首先，从文字形式上看，它的字母体式是仿八思巴字篆体而成；书写格式包括字母自上而下竖写的方法和自右往左的行款，都沿用的是八思巴字的书写方法<sup>9</sup>。其次，在清代藏文文献中一律将这种文字称作“霍尔依”（ $\text{ཧོར་ཡིག}$ ），即蒙古字，这表明藏族人并不认为这种文字是藏文的一种，而是将其与元代八思巴为蒙古人创制的八思巴字联系在一起。最后，在清代西藏地方上存在一些既有藏文或蒙古文，又刻写这种文字的多语合璧印章，例如收藏在布达拉宫的桑杰嘉措之“达赖喇嘛谕遍胜人王布忒达阿白迪供施之印”<sup>10</sup>、贡贝堪

1 宋濂：《元史·释老传》卷二〇二，北京：中华书局，1976：4518。

2 照那斯图、薛磊：《元国书官印汇释》，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11。

3 王尧：《藏文》，《民族语文》1979（1）：72。

4 松儒布：《介绍两份八思巴字文献》，载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汇编：《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1。

5 陈庆英：《塔尔寺楹联上的八思巴字》，《西藏研究》1986（3）：51。

6 欧朝贵、其美：《西藏历代藏印》（序言），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1：2。

7 贾拉森：《阿拉善活佛印章所刻八思巴文释读》，《内蒙古大学学报》（蒙文版）1993（3）。乌力吉白乙拉：《八思巴文变形体研究》（蒙古文），内蒙古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65-71。包呼宝力高：《八思巴字印章体研究》（蒙古文），内蒙古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72-77。

8 照那斯图：《一种从八思巴字脱胎而来的文字》，《民族语文》2003（2）：58。照那斯图：《关于八思巴字“圣人·宝贝·吉祥”印》，载《西域历史语言研究集刊》第二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25-27。

9 照那斯图：《一种从八思巴字脱胎而来的文字》，《民族语文》2003（2）：58。

10 欧朝贵、其美：《西藏历代藏印》，1991：63。

布札萨克达喇嘛之印”<sup>11</sup>、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三语合璧金印<sup>12</sup>，以及热振摄政的“热振阿其图慧灵呼图克图之印”<sup>13</sup>等。这些例子表明，在藏族人观念里，这种文字是与藏文和蒙古文都不相同的文字。因此，我们也不能笼统地将其等同视之。

从保存下来的文物材料看，印章是清朝八思巴字在西藏最主要的用途。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德国藏学家迪特·舒（Dieter Schuh）根据自己所见的三十多件藏文档案上加盖的印章文字，对八思巴字印章进行了识读和研究，可称为清代西藏八思巴字印章研究的一部开拓性专著<sup>14</sup>。不无遗憾的是，由于这部专著是由德语写成，它在中国学界的影响力并不广布，加之受当时材料公布和研究视角的限制，作者重点结合档案资料对印章文字进行考释，并未对八思巴字印章及印章本身特性进行搜集和研究。在中国学术界，由于多数学者对这种新创文字都比较陌生，再加上印章资料零散复杂的结构特性，相较其他语种的印章，八思巴字印章尚未引起学者们的足够重视。目前所见，以往的研究多是对这类印章比较零散的简要考释，且相关考释主要是对印章文字的粗略译解<sup>15</sup>，多有不准确或讹误之处。有鉴于此，笔者拟在前贤们的研究基础上，结合新近公布的文物和档案资料，进一步对清朝西藏的八思巴字印章实物和印文资料进行系统搜集和考释，并对这种印章的形制特点、使用情况和出现原因等问题进行探讨。

## 二、清代西藏八思巴字印章举例

本文所讨论的八思巴字印章，是指印面文字只有八思巴字一种文字的印章，其他印面中包含有八思巴字的多语合璧印章，在此不作讨论。从文物材料来看，现今存世的清代八思巴字印章实物并不是很多，多数是连同档案文书以印文形式保存下来。根据这些

11 功德林寺档案，编号 K602。见德国波恩大学西藏档案资料数字化网站（Digitized Tibetan Archives Material at Bonn University）：<http://www.dtab.uni-bonn.de/tibdoc/index1.htm>（资料检索时间截止于2018年9月）。本文引用的多数档案和印章图片都采自该网站，档案与印章编号也是直接采用网站中的原编号，即以大写字母“K”代表“功德林寺”，后文不再说明。

12 欧朝贵、其美：《西藏历代藏印》，1991：64。西藏自治区博物馆编，何晓东著：《历史的见证：西藏自治区博物馆藏历代中央政府治藏文物集萃》，成都：四川美术出版社，2015：152-153。

13 邹西成：《中国西藏文化博物馆展品中的三枚清代摄政王印章初考》，《中国藏学》2010（3）：106。

14 Dieter Schuh, *Grundlagen tibetischer Siegelkunde: Eine Untersuchung über tibetische Siegelaufrschriften in Phags-pa-Schrift*, Sankt Augustin: Hans Richarz Publikations-Service, 1981.

15 རྗེ་ཐུག་ལ་དབང་འདུས་ཚེ་རིང་། དེའི་ཚེས་ལོང་བའི་དམིགས་ལུ་དང་ཐམ་དེའ། ཚབ་སྤེལ་ཚེ་བཟན་ལུན་ཚོགས། བོད་ཀྱི་གལ་ཚེའི་ལོ་རྒྱུས་ཡིག་ཆ་བདམས་བསྐྱོད་ལ། ལྷ་ས། བོད་ཚོང་ས་བོད་ཡིག་དཔེ་ལྷན་དཔེ་ལྷན་ཁང་། 1991: 1-83. 陈金钟：《元以来中央政权颁授西藏地方首领印章举要》，《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88（3）：14-22. 陈金钟：《中央政府颁授达赖、班禅之金册金印》，《中国西藏》1996（1）：38-48。

印章的属性特点可将清代西藏的八思巴字印章分为四类，以下分别作介绍。

### （一）宗教首领用印

#### 1. 持金刚达赖喇嘛之印（图一：1）

铜印，宝珠形木纽，高11.5厘米，方形，边长11厘米，西藏自治区博物馆藏<sup>16</sup>。共三行印文，转录为藏文：རྫོགས་འཆང་ཏུ་ལའི་སྐ་མའི་ཐམ་ཀ་བྱུལ། 汉译：持金刚达赖喇嘛之印胜。该印原型是蒙古顺义王俺答汗于1578年颁授给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བསོད་ནམས་བྱ་མཚོ། 1543-1588年）的印章，原印为金印，今已不存。据文献记载，这颗金印为龙纽<sup>17</sup>。现存铜印是后期复制印，在清朝的藏文档案中可见到历辈达赖喇嘛承袭使用此印<sup>18</sup>。

#### 2. 持金刚之印（图一：4）

铁印，宝珠形木纽，高9厘米，方形，边长4.3厘米，西藏自治区博物馆藏<sup>19</sup>。共有三行印文，仅可辨识出中间一行的八思巴字，转录为藏文：བ་ཇ་རྩ་ས།，是对梵文“Vajradhara”的藏文转写，藏文意为：རྫོགས་འཆང། 汉译：持金刚。印文的外围有两圈方框。原印系有布条说明为五世达赖喇嘛的印章，该印章在《噶厦印谱》中被称作“印中心有‘班杂达拉’三行蒙文的旧印”<sup>20</sup>。从印文内容可以推测，这枚印章是根据俺答汗赐封三世达赖喇嘛的金印复制而成。

#### 3. 持金刚达赖喇嘛之印（图一：5）

方形，尺寸不详，红色印文。印面文字和排列布局都与西藏自治区博物馆内保存的铜印“持金刚达赖喇嘛之印”<sup>21</sup>基本相同，仅是在印章起首部分稍有差异。共三行印文，转录为藏文：རྫོགས་འཆང་ཏུ་ལའི་སྐ་མའི་ཐམ་ཀ་བྱུལ། 汉译：持金刚达赖喇嘛之印胜。这枚印章是根据俺答汗赠给三世达赖喇嘛的金印复制而成的印章，被历辈达赖喇嘛承袭使用。

#### 4. 班禅喇嘛之印（图一：6）

方形，边长5.7厘米，印文红色<sup>22</sup>。共三行印文，转录为藏文：དགེ་འདུན་མཆལ་(?)་པ།

16 欧朝贵、其美：《西藏历代藏印》，1991：47。西藏自治区博物馆编，何晓东著：《历史的见证：西藏自治区博物馆藏历代中央政府治藏文物集萃》，2015：86-87。

17 五世达赖喇嘛著，陈庆英、马连龙译：《一世——四世达赖喇嘛传》，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241。

18 Dieter Schuh, *Grundlagen tibetischer Siegelkunde*, 1981: 7. 功德林寺档案，编号 K835。

19 欧朝贵、其美：《西藏历代藏印》，1991：66。功德林寺档案，编号 K423。

20 诺杰朗巴·旺堆次仁著，刘立千译：《噶厦印谱译注》，《中国藏学》1990（1）：89。

21 Dieter Schuh, *Grundlagen tibetischer Siegelkunde*, 1981: 6. 功德林寺档案，编号 K424。

22 Dieter Schuh, *Grundlagen tibetischer Siegelkunde*, 1981: 23。

音译：格敦切巴。从档案看，这枚印章是第六世和第七世班禅喇嘛的用印。印文中前半部分“དགེ་འདུན”是“僧伽、僧团”之意，后半部分藏文意思待考。在青海省博物馆内收藏的1776年第六世班禅喇嘛致蒙藏僧俗之文告<sup>23</sup>，即钤盖此印。

#### 5. 察雅活佛之印（图一：2）

铁印，宝珠型木纽，高7.6厘米，方形，边长3.6厘米，西藏自治区博物馆藏<sup>24</sup>。共五行印文，转录为藏文为：བླ་གཡལ་སྤུལ་སྤྱི་ཐམ་ག་ཕྱོགས་དུས་ཀྱན་དུ་ནམ་པར་རྒྱལ་ལོ། 汉译：察雅活佛之印时空全胜。察雅县在今昌都地区，察雅活佛指察雅县麻贡寺的活佛世系，有清一朝，察雅活佛与中央政府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康熙末年，清朝平准大军进藏途径昌都地区，曾受到察雅活佛的帮助，此后历辈察雅活佛都先后受到清政府的封赐<sup>25</sup>，这枚印章应是察雅活佛的自制用印。

#### 6. 察雅呼图克图诺门罕之印（图一：8）

镀金铁印，檀香木如意纽，二台，高7.7厘米，方形，边长3.4厘米，昌都地区文化局藏<sup>26</sup>。共四行印文，转录为藏文：བླ་གཡལ་ཉོ་ཐོག་ཐུ་མེན་ཉན་གྱི་ཐམ་ག་རྒྱལ་ལོ། 汉译：察雅呼图克图诺门罕之印胜利。此印是察雅活佛的用印。

#### 7. 察雅诺门罕呼图克图之印（图一：9）

镀金铁印，镂空如意纽，高8.6厘米，方形，边长4.7厘米，印面上方有日月组合标记，昌都地区文化局藏<sup>27</sup>。共三行印文，转译为藏文：བླ་གཡལ་ཉོ་ཐོག་ཉན་ཉོ་ཐོག་ཐུ་མེན་ག་ཀྱན་དུ་ནམ་པར་རྒྱལ་ལོ། 汉译：察雅诺门罕呼图克图之印全胜。此印也属于察雅活佛的用印。

#### 8. 弘扬佛教达察班智达灌顶大国师之印（图一：3）

银印，宝珠形木纽，高8.2厘米，方形，边长5厘米，西藏自治区博物馆藏<sup>28</sup>。共五行印文，转录为藏文：བསྐྱེད་པའི་གསལ་བྱེད་སྐྱག་བླ་མ་ཉི་ཉེ་ཀྱན་ཉིང་ཉའི་ཀྱི་ཤིའི་ཐམ་ག་དགེ་ལེགས་འཕེལ། 汉译：弘扬佛教达察班智达灌顶大国师之印妙善繁荣。达察活佛的驻寺在拉萨西郊堆隆德庆县乃琼乡，该世系中曾有活佛担任过西藏摄政，受到清廷封赏。

#### 9. 达察班第达之政教业绩优胜之印（图一：10）

银印，双鱼佛轮纽，高12厘米，方形，边长6.7厘米，西藏自治区博物馆藏<sup>29</sup>。共

23 青海省博物馆、青海民族博物馆：《河湟藏珍：藏传佛教文物卷》，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182-183。

24 图片由西藏自治区博物馆提供。

25 欧朝贵、其美：《西藏历代藏印》，1991：97。

26 欧朝贵、其美：《西藏历代藏印》，1991：98。

27 欧朝贵、其美：《西藏历代藏印》，1991：98。

28 图片由西藏自治区博物馆提供。另见欧朝贵、其美：《西藏历代藏印》，1991：87。

29 欧朝贵、其美：《西藏历代藏印》，1991：87。

七行印文，转录为藏文：གངས་ལྗོངས་བསྟན་འགྲོའི་ཕན་བདེའི་དཔལ་མགོན་ཡོངས་འཛིན་སྟག་བྲག་པཎ་ཏི་ཏ་ཡི་  
ཚོས་སྲིད་འཕྲིན་ལས་བཟང་པའི་དགེ་མཚན་མཚོག་ཏུ་འབར་བའི་ཐམ་ག་བཟ་ཤིས་བདེ་རྒྱུད་འཕེལ། 汉译：雪域佛教众  
生利益护持经师达察班第达之政教业绩优胜之印吉祥如意。此印是达察活佛的用印。

#### 10. 管理西藏事务弘扬黄帽佛教吉祥诺门罕之印（图一：11）

铁印，宝珠形木纽，高7厘米，方形，边长5厘米，现藏西藏自治区博物馆<sup>30</sup>。共六  
行印文，转录为藏文：བོད་ཀྱི་ལས་དོན་ཁྲུང་འཛིན་ལྷ་སེར་བསྟན་པ་འཛིན་བྱེད་དཔལ་ལྷན་ནོ་མིན་ཉན་གྱི་ཐམ་ག་  
ཟིམ་པར་རྒྱལ་ལོ། 汉译：管理西藏事务弘扬黄帽佛教吉祥诺门罕之印诸事全胜。此印是西藏地  
方根据朝廷颁赐的蒙藏满三语合璧银印自制之印，被达察活佛以后的历任摄政承袭使用。

#### 11. 济隆呼图克图寺院主持扎萨克喇嘛之印（图一：12）

铁印，宝珠木纽，高7.9厘米，方形，边长3.4厘米，西藏自治区博物馆藏<sup>31</sup>。共五  
行印文，转录为藏文：རྗེ་བློན་ཏུ་ཐོག་ཐུའི་གདན་སའི་ལས་དོན་རྩ་སྒྲིག་ལཱ་མའི་དམ་ཁྱེད་ཀྱི་རྒྱལ་ལོ། 汉  
译：济隆呼图克图寺院主持扎萨克喇嘛之印诸事全胜。“济隆”为“རྗེ་བློན་ཏུ་”音译，又称  
作济咙或济中。济隆呼图克图是西藏有名的活佛转世系统。第六世、七世和八世济隆活  
佛都曾前往北京，曾受到清廷颁授印章<sup>32</sup>。此印是根据朝廷封印自制的印章。

#### 12. 弘扬黄帽阿其图慧灵呼图克图之印（图一：13）

铁印，直纽，高5厘米，方形，边长4.8厘米，收藏地不详<sup>33</sup>。共五行印文，转录为  
藏文：ལྷ་སེར་བསྟན་པ་གསལ་བར་བྱེད་པའི་ཨ་ཆེ་ཐུ་ནིང་ཏོ་ཐོག་ཐུའི་ཐམ་ག་དགེ་ལེགས་འཕེལ། 汉译：弘扬黄帽  
阿其图慧灵呼图克图之印妙善繁荣。阿其图是蒙古语 *ačitu*，意思是“功劳、勋功”，清  
朝借以封授蒙藏高僧。据文献记载，“阿其图慧灵呼图克图”是第三世热振活佛阿旺益  
西楚臣坚赞（*ངག་དབང་ཡེ་ཤེས་ཚུལ་ཁྲིམས་རྒྱལ་མཚན།* 1816-1863年）的名号<sup>34</sup>。

#### 13. 皇帝谕旨弘扬佛教吉祥诺门罕之印（图一：14）

方形，边长6.3厘米，印文红色<sup>35</sup>。共六行印文，转录为藏文：གོང་མའི་ཡུང་གིས་ལྷ་སེར་གྱི་  
བསྟན་པ་འཛིན་བྱེད་དཔལ་ལྷན་ནོ་མིན་ཉན་གྱི་ཐམ་ག་བཟ་ཤིས་དགེལ། 汉译：皇帝谕旨弘扬佛教吉祥诺门罕  
之印圆满。据档案和文献记载，该印章主人是达结林第六世第穆呼图克图阿旺强白德勒

30 欧朝贵、其美：《西藏历代藏印》，1991：90。

31 欧朝贵、其美：《西藏历代藏印》，1991：86。

32 昆冈、李鸿章等修，赵云田点校：《钦定大清会典事例·理藩院》，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160。

33 欧朝贵、其美：《西藏历代藏印》，1991：84。

34 《西藏研究》编辑部：《清代藏事辑要》（第一辑），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3：460、493。

35 Dieter Schuh, *Grundlagen tibetischer Siegelkunde*, 1981: 111-112. 功德林寺档案，编号 K425、K1234、K788。



图一 清代西藏八思巴字印章（一）

（1. 持金刚达赖喇嘛之印 2. 察雅活佛之印 3. 弘扬佛教达察班智达灌顶大国师之印 4. 持金刚之印 5. 持金刚达赖喇嘛之印 6. 班禅喇嘛之印 7. 类乌齐印 8. 察雅呼图克图诺门罕之印 9. 察雅诺门罕呼图克图之印 10. 达察班第达之政教业绩优胜之印 11. 管理西藏事务弘扬黄帽佛教吉祥诺门罕之印 12. 济隆呼图克图寺院主持扎萨克喇嘛之印 13. 弘扬黄帽阿其图慧灵呼图克图之印 14. 皇帝谕旨弘扬佛教吉祥诺门罕之印 15. 慧通禅师济隆呼图克图之印 16. 额尔德尼诺门罕之印 17. 管理西藏事务黄帽班丹诺门罕之印）

嘉措（*ངག་དབང་འཇམ་དཔལ་བདེ་ལེགས་ཀྱི་མཚོ།* 1724-1777 年）<sup>36</sup>。

#### 14. 慧通禅师济隆呼图克图之印（图一：15）

方形，边长 4.7 厘米，红色印文<sup>37</sup>。共七行印文，转录为藏文：*གནམ་བསྐོས་འཇམ་དབྱངས་གོང་མ་ཚེན་པོ་ཡི་བཀས་ཡི་ཤེས་ཡོངས་རྗེས་བསམ་གཏན་མཁན་པོ་ཚེ་རུང་ཏུ་ཐུག་ཐུའི་ཐམ་ག་བཟླ་ཤིས་དགེ་ལེགས་འཕེལ།* 汉译：奉天承运文殊菩萨大皇帝敕封慧通禅师济隆呼图克图之印吉祥如意。从现存档案和印文内容看，这枚印章主人是达察摄政，即济隆呼图克图一系。

#### 15. 额尔德尼诺门罕之印（图一：16）

方形，边长 6.2 厘米，红色印文<sup>38</sup>。共五行印文，转录为藏文：*བཀས་བོད་གྱི་ལས་དོན་ཁུང་འཛིན་ལུ་མེད་བསྟན་པ་འཛིན་བྱེད་ཨེར་ཉི་ལོ་མེད་ཏན་གྱི་ཐམ་ག་རྒྱལ།* 汉译：奉天承运办理西藏事务掌办佛教额尔德尼诺门罕之印胜利。从现存档案判断，该印章的主人是第三世热振活佛阿旺益西楚臣坚赞。

#### 16. 管理西藏事务黄帽班丹诺门罕之印（图一：17）

方形，边长 4.7 厘米，印文红色<sup>39</sup>。共六行印文，转录为藏文：*བོད་གྱི་ལས་དོན་ཁུང་འཛིན་ལུ་མེད་བསྟན་པ་འཛིན་བྱེད་དཔལ་ལྷན་ལོ་མེད་ཏན་གྱི་ཐམ་ག་རྒྱལ་པར་རྒྱལ་ལོ།* 汉译：管理西藏事务黄帽班丹诺门罕之印常胜。这枚印章是摄政用印，是西藏地方上根据朝廷颁赐的蒙、藏、满三语合璧银印复制之印，为达察以后历任摄政承袭使用。

#### 17. 弘扬佛教额尔德尼诺门罕之印（图二：1）

方形，边长 5.8 厘米，红色印文<sup>40</sup>。共四行印文，转录为藏文：*བསྟན་པའི་གསལ་བྱེད་ཨེར་ཉི་ལོ་མེད་ཏན་གྱི་ཐམ་ག་རྒྱལ།* 汉译：弘扬佛教额尔德尼诺门罕之印。从现存档案看，这枚印章的主人是第一世策墨林活佛阿旺楚臣（*ངག་དབང་ཚུལ་ཁྲིམས།* 1721-1791 年），藏历火马年（1786 年）他颁给甘丹达吉林寺的文告中钤盖了此印<sup>41</sup>。有学者认为该印章是清廷颁赐<sup>42</sup>，但从印章特点分析，应属于西藏地方的自制印。

36 陈金钟认为此印是清朝的官方赐印，这种判断不准确，该印应系西藏自制印章，详见后文。陈金钟：《元以来中央政府颁授西藏地方首领印章举要》，《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8（3）：21。

37 Dieter Schuh, *Grundlagen tibetischer Siegelkunde*, 1981: 130. 功德林寺档案，编号 K428。

38 Dieter Schuh, *Grundlagen tibetischer Siegelkunde*, 1981: 222. 功德林寺档案，编号 K426。

39 Dieter Schuh, *Grundlagen tibetischer Siegelkunde*, 1981: 131-132.

40 Dieter Schuh, *Grundlagen tibetischer Siegelkunde*, 1981: 128. 功德林寺档案，编号 K483。

41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西藏自治区档案馆：《西藏社会历史藏文档案资料译文集》，1997：80-81。

42 陈金钟：《元以来中央政府颁授西藏地方首领印章举要》，《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8（3）：20。

#### 18. 福德圆满法王治下吉祥遍地（图二：2）

方形，尺寸不详，印文红色<sup>43</sup>。共六行印文，转录为藏文：བསོད་ནམས་སྟོབས་དང་འབྱོར་པ་  
ལུན་ཚོགས་རྗེས་ལྷན་ཐམས་ཅད་དབང་བས་བསྐྱེད་ཀྱི་རྒྱལ་པོའི་མངའ་ཐང་པ་ཉན་པས་ས་སྟེང་ཁྱབ་ཅིང་བདེ་ལེགས་སུ་  
རྒྱར་རོ། 汉译：福德圆满法王治下吉祥遍地。从现存档案来看，该印主人是第九世第穆活  
佛阿旺洛桑赤列饶杰（དེ་མོ་ངག་དབང་སྟོ་བཟང་འཕྲིན་ལས་རབ་རྒྱལ། 1856-1900年），藏历木羊年  
（1895年），他颁给敏拉卓巴之封文铃盖了此印<sup>44</sup>。

#### 19. 毕理克图额尔德尼诺门罕之印（图二：3）

方形，尺寸不详，印文红色，在正中上方有一个藏文字母“ག”<sup>45</sup>。共四行印文，转  
录为藏文：བི་རེ་གེ་ཐུ་ཨེར་ཉི་ཁི་ལོ་མེན་ཉན་གྱི་ཐམ་ག་རྒྱལ་ལོ། 汉译：毕理克图额尔德尼诺门罕之印。  
西藏自治区博物馆收藏有件加盖该印章的藏文文告，是由毕理克图额尔德尼诺门罕发  
布。据文献记载，“毕理克图额尔德尼诺门罕”是济隆呼图克图的名号<sup>46</sup>。该印章应是根  
据朝廷封印复制而成。

#### 20. 办理西藏事务掌管黄教吉祥诺门罕之印（图二：4）

方形，尺寸不详，印文红色<sup>47</sup>。共六行印文，转录为藏文：བོད་ཀྱི་ལས་དོན་ཁྲུང་འཛིན་ལྷ་སེང་  
བསྟན་པ་འཛིན་བྱེད་དཔལ་ལྷན་ལོ་མེན་ཉན་གྱི་ཐམ་ག་རྒྱལ་ལོ། 汉译：办理西藏事务掌管黄教吉祥诺  
门罕之印一切胜利。从现存档案判断，这枚印章是西藏摄政的用印。西藏自治区档案馆  
内有“济隆呼图克图及诸噶伦为辅放代本事咨驻藏大臣文”中铃盖的便是此印<sup>48</sup>，说明此  
印曾为达察摄政活佛所用。

#### 21. 弘扬佛教大国师敏珠诺门罕之印（图二：5）

方形，尺寸不明，印文红色<sup>49</sup>。共五行印文，转录为藏文：བསྟན་པའི་གསལ་བྱེད་ཉའི་གུ་ཕྱི་  
སློན་གྲོལ་ནོ་མོན་ཁང་གི་ཐམ་ག་རྒྱལ། 汉译：弘扬佛教大国师敏珠诺门罕之印胜。此印是敏珠林活  
佛的用印。

#### 22. 扎西桑丹林之主持额尔德尼呼图克图之印（图二：6）

方形，边长4.2厘米，印文红色<sup>50</sup>。共七行印文，转录为藏文：མདོ་སྲགས་ཉིང་འཛིན་ལེགས་

43 Dieter Schuh, *Grundlagen tibetischer Siegelkunde*, 1981: 58.

44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西藏自治区档案馆：《西藏社会历史藏文档案资料译文集》，1997：94。

45 图片由西藏自治区博物馆提供。

46 昆冈、李鸿章等修，赵云田点校：《钦定大清会典事例·理藩院》，2006：161-162。

47 Dieter Schuh, *Grundlagen tibetischer Siegelkunde*, 1981: 132. 功德林寺档案，编号 K448。

48 西藏自治区档案馆编：《西藏历史档案荟萃》，北京：文物出版社，1995：51-52。

49 功德林寺档案，编号 K709。

50 Dieter Schuh, *Grundlagen tibetischer Siegelkunde*, 1981: 28.



ཐུལ་པོ་1750年)是颇罗鼐之子,1739年被委任为头等台吉,管理藏北达木蒙古。1747年承袭其父郡王爵。1750被清朝驻藏大臣诛杀。

## 2. 以贝子康济鼐为首席噶伦贝子阿沛巴为协助噶伦之印(图二:11)

方形,尺寸不明,印文红色<sup>56</sup>。共六行印文,印文不清晰,仅能部分释读,转录为藏文:པའི་ལི་ཁང་ཆེན་པས་གཙོ་བོ་པའི་ལི་ང་ཕོད་ལས་རོགས་རམ་པ་སོགས་ཆིང་གི་རྩེ་རྩེ་(?)གནས་ཀྱི་ཐམ་ག་རྒྱལ་དགུ་ལོ། 汉译:以贝子康济鼐为首席噶伦贝子阿沛巴为协助噶伦之印常胜。1721至1727年,西藏由康济鼐、阿尔布巴多吉、隆布鼐、颇罗鼐和甲然洛卓等共同主持政务,当时政府公文中即使用此印。1740年颇罗鼐发布的一件文告中钤盖了此印<sup>57</sup>,说明直到此时,该印章仍在使

## 3. 颇罗台吉索南达杰之印(图二:12)

方形,边长4.9厘米,印文既有红色,也有黑色<sup>58</sup>。共五行印文,转录为藏文:ཕོ་ལྷ་ཐའི་ཇི་བསོད་ནམས་སྟོབས་རྒྱལ་གྱི་ཐམ་ག་དོན་ཀུན་གྲུབ་པ། 汉译:颇罗台吉索南达杰之印诸事成功。在迪特·舒的书中公布有两件档案使用了此印<sup>59</sup>,另外还有多件功德林寺档案也使用此印<sup>60</sup>。

## 4. 人王索南达杰颇罗鼐之印(图二:13)

方形,边长6.5厘米,印文红色。共六行印文,转录为藏文:མིའི་དབང་ཕོ་བསོད་ནམས་སྟོབས་ཀྱི་རྒྱལ་ཕོ་ཕོ་ལྷ་དབང་གྱི་ཐམ་ག་ཕྱོགས་ཐམས་ཅད་ལས་རྣམ་པར་རྒྱལ་བ་དོན་ཀུན་འགྲུབ་པ་བཟང་ཤིས་སོ་རྟག་ཏུ་ལྷ་རྒྱལ་ལོ་དགེལ། 汉译:人王索南达杰颇罗鼐之印祝愿诸事成就无往不胜所到之处悉成吉祥。迪特·舒书中有一件档案使用此印<sup>61</sup>。另在功德林寺档案中有颇罗鼐颁发的文告中使用该印章<sup>62</sup>。

## 5. 颇罗鼐台吉索南达杰之印(图二:14)

方形,边长3.9厘米,印文黑色<sup>63</sup>。共六行印文,转译为藏文:ཕོ་ལྷ་ཐའི་ཇི་བསོད་ནམས་སྟོབས་རྒྱལ་གྱི་ཐམ་ག་དོན་ཀུན་གྲུབ་པ་ཕྱོགས་ཐམས་ཅད་ལས་རྣམ་པར་རྒྱལ་ཞིང་གནས་སྐབས་ཀིན་ཏི་བཟང་ཤིས་ཀྱི་སྣང་བ་དམ་པས་ཁྱབ་པར་ཤོག 汉译:颇罗鼐台吉索南达杰之印愿殊胜一切诸事成功吉祥之光普照四方。从印章内容可知,这枚印章的主人是颇罗鼐,功德林寺档案中可以见到颇罗鼐发布的文

56 陈金钟:《西藏第司历任世系之印》,《西藏研究》1995(1):121。

57 功德林寺档案,编号K1221。

58 陈金钟:《西藏第司历任世系之印》,《西藏研究》1995(1):121。

59 Dieter Schuh, *Grundlagen tibetischer Siegelkunde*, 1981: 68.

60 功德林寺档案,编号K799。

61 Dieter Schuh, *Grundlagen tibetischer Siegelkunde*, 1981: 69-70.

62 功德林寺档案,编号K1217。

63 Dieter Schuh, *Grundlagen tibetischer Siegelkunde*, 1981: 71.

告中钤盖了此印章<sup>64</sup>。

#### 6. 台吉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之印（图二：15）

长方形，长4、宽3.8厘米，藏处不详<sup>65</sup>。共四行印文，转录为藏文：ཐའི་ཇི་འགྲུར་མེད་  
རྣམ་རྒྱལ་གྱི་ཐམ་ག་ཕྱོགས་ཐམས་ཅད་ལས་རྒྱལ་ལོ། 汉译：台吉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之印十方全胜。该印  
章是珠尔默特那木扎勒的用印。

### （三）蒙古汗王用印

#### 1. 达赖汗之印（图二：16）

方形，边长5.5厘米，印文红色<sup>66</sup>。共三行印文，转录为藏文：ཤ་བྱི་ནི་བ་རིག་ཆེ་དུ་ལའི་ཁན།  
汉译：夏其尼巴里齐达赖汗。从现存档案和印文判断，该印是达赖汗的用印，他是蒙古  
和硕特部首领，达延汗的长子。康熙十年（1671年）进驻拉萨承袭汗位，五世达赖喇嘛  
赐他以“丹津达赖汗”（བསྟན་འཛིན་དུ་ལའི་རྒྱལ་པོ།）封号，并赐印信。这枚印章即是五世达赖  
喇嘛颁授给达赖汗的印章<sup>67</sup>。功德林寺内收藏有两件达赖汗分别于1685和1692年向藏地  
百姓发布的文告中都是钤盖此印<sup>68</sup>。

#### 2. 罗卜藏丹津之印（图二：17）

方形，尺寸不详，印文红色，在印上方有三个小圆圈组成的“品”字形标识<sup>69</sup>。共三  
行印文，转录为藏文：རྫོ་བཟང་བསྟན་འཛིན་གྱི་ཐམ་ག་ 汉译：罗卜藏丹津之印。罗卜藏丹津是固  
始汗之孙，驻地在青海东部。根据清朝早期蒙藏关系历史规制，该印应是达赖喇嘛封授  
给罗卜藏丹津<sup>70</sup>。在西藏功德林寺档案中，有一件藏历铁牛年（1721年）由罗卜藏丹津  
发布给西藏僧俗百姓的文告，在文告的起首语处即钤盖此印<sup>71</sup>。

64 功德林寺档案，编号 K1214。

65 Dieter Schuh, *Grundlagen tibetischer Siegelkunde*, 1981: 104.

66 Dieter Schuh, “Politische Implikationen tibetischer Urkundenformeln.” *Archiv für Zentralasiatische Geschichtsforschung*, heft 9, Sankt Augustin: VGH-Wissenschaftsverlag, 1985: 1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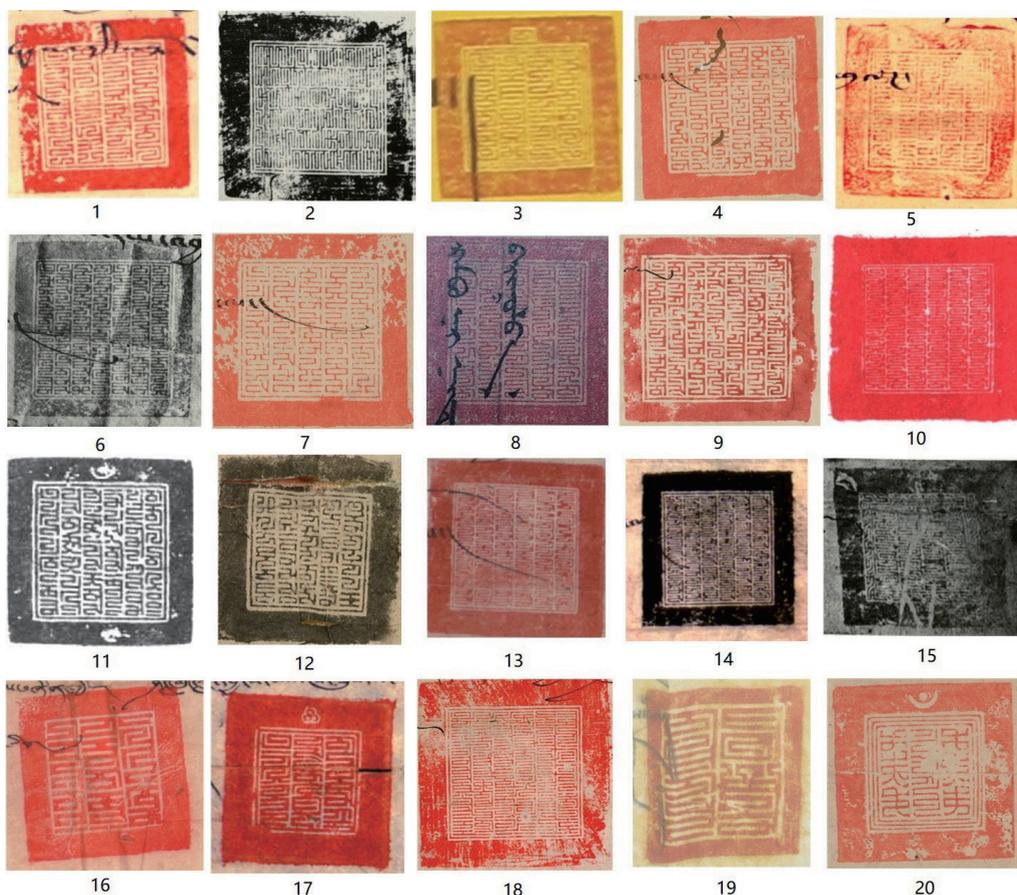
67 Ishihama Yumiko, “A Study of the Seals and Titles Conferred by the Dalai Lamas.” In *Tibetan Studies: Proceedings of the 5th Seminar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ibetan Studies, Narita 1989*, eds. Ihara Shoren and Yamaguchi Zuiho, Narita: Naritasan Shinshoji, 1992. 汉译本见黄维忠译：《达赖喇嘛所授印章和封号的研究》，《国外藏学译文集》第十二辑，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53-78。

68 功德林寺档案，编号 K2091 和 K1351。

69 Dieter Schuh, *Grundlagen tibetischer Siegelkunde*, 1981: 61.

70 石滨裕美子著，黄维忠译：《达赖喇嘛所授印章和封号的研究》，《国外藏学译文集》第十二辑，1995：53-78。

71 功德林寺档案，编号 K1409。



图二 清代西藏八思巴字印章（二）

（1. 弘扬佛教额尔德尼诺门罕之印 2. 福德圆满法王治下吉祥遍地 3. 毕理克图额尔德尼诺门罕之印 4. 办理西藏事务掌管黄教吉祥诺门罕之印 5. 弘扬佛教大国师敏珠诺门罕之印 6. 扎西桑丹林之主持额尔德尼呼图克图之印 7. 慧通禅师统领之印 8. 章嘉呼图克图之印 9. 高贵圣主敕封普世稀有法王之政治事业幸福吉祥如意印 10. 颇罗哇多罗郡王坦喇巴图岱青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之印 11. 以贝子康济鼐为首席噶伦贝子阿沛巴为协助噶伦之印 12. 颇罗台吉索南达杰之印 13. 人王索南达杰颇罗鼐之印 14. 颇罗鼐台吉索南达杰之印 15. 台吉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之印 16. 达赖汗之印 17. 罗卜藏丹津之印 18. 愿法王权辉遍及全地征服一切具傲慢福泽繁荣富强幸福来临印 19. 额尔德尼洪台吉之印 20. 幸福印）

3. 愿法王权辉遍及全地征服一切具傲慢福泽繁荣富强幸福来临印（图二：18）

方形，边长 7.9 厘米，印文红色<sup>72</sup>。共六行印文，转录为藏文：བསོད་ནམས་(ནམས)·

72 Dieter Schuh, *Grundlagen tibetischer Siegelkunde*, 1981: 50-52. 陈金钟：《西藏第司历任世系之印》，《西藏研究》1995（1）：120。

སྟོབས་དང་འབྱོར་པ་ཕྱིན་ཚོགས་དགས་ལྡན་ཐམས་ཅད་དབང་བསྐྱེད་ཚོས་ཀྱི་རྒྱལ་པོའི་མངའ་ཐང་པ་ནན་པས་ས་སྟོང་ཁྲལ་ཅིང་  
བདེ་ལེགས་སུ་གྱུར་རྟེ། 汉译：愿法王权辉遍及全地征服一切具傲慢福泽繁荣富强幸福呈祥。从  
现存档案判断，这枚印章是蒙古和硕特部首领拉藏汗的用印。在功德林寺的档案中，至  
少有三件拉藏汗发布的藏文文告中启用了此印章<sup>73</sup>。

#### 4. 额尔德尼洪台吉之印（图二：19）

方形，尺寸不详，印文红色。共两行印文，因档案保存状况不佳，印文内容无法辨  
识。从现存档案来看，这枚印章的主人是达赖洪台吉（ད་ལས་རྒྱལ་ཐའི་ཇི། ?-1690年），他是  
卫拉特蒙古和硕特部的首领，藏名丹增达赖，是达延汗长子。在青海省博物馆保存有一  
件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达赖洪台吉颁给三世察罕诺门罕照旧管理事宜之文告，在  
文告末尾钤盖了这方印<sup>74</sup>。该印应是五世达赖喇嘛封授给达赖洪台吉之印。

#### （四）其他

从现存资料看，除了上述印文内容直接标示印章主人名讳或官职的八思巴字印章以  
外，还有一些没有标明印主的地名或吉语印章。如西藏自治区博物馆收藏的“类乌齐”  
印（图一：7），该印为木质，狮纽，高3.8厘米，方形，边长4.4厘米<sup>75</sup>。印面下方是五  
瓣莲花，上方是佛教三宝。印面中间刻有三个八思巴字，转写成藏文是：རི་ཕོ་ཆེ།（类  
乌齐）。类乌齐在今昌都地区，这里的印文应当就是指代该地。再如档案中的“吉隆”印，  
印面呈方形，边长1.7厘米<sup>76</sup>。该印共有两行印文，转写成藏文是：རྫིང་གོང་།（吉隆），吉  
隆在今西藏日喀则市西南部。吉语印章的内容一般都比较简单，如“幸福（བདེ་སྦྱིད་）”印  
（图二：20）和“吉祥（བཀྲ་ཤིས་）”印，等等。

### 三、八思巴字印章的特点分析

通过对目前已搜集到的清朝八思巴字印章资料的观察和分析，我们可以对这类印章  
的形制特点进行如下归纳和总结。

第一，从形制和尺寸看，八思巴字印章的印面基本都是方形。这类印被制作成方形

73 功德林寺档案，编号 K1235、K1918、K2051。

74 青海省博物馆、青海民族博物馆：《河湟藏珍：藏传佛教文物卷》，2012：165。

75 欧朝贵、其美：《西藏历代藏印》，1991：100。

76 Dieter Schuh, *Grundlagen tibetischer Siegelkunde*, 1981: 31.

是由其外形特征所决定，因为方形文字排列在方形印面上比圆形印面更合适。印章尺寸大小各有不同，边长多在 2-13 厘米间，以 4-7 厘米间最常见。高度在 5-13 厘米间，以 7-9 厘米间最多见。第二，从印章质地看，八思巴字印章有银印、铁印、铜印等。其中以铁质最多，银质次之，目前铜印仅见一例，即“持金刚达赖喇嘛之印”。第三，从印章纽式看，八思巴字印章的纽式比较丰富。从前文可知，纽式主要包括宝珠纽、如意纽、双鱼佛轮纽、直纽等。

第四，关于八思巴字印章的印文特点可以从其字体、字数、字文和印色等方面进行考察。（1）字体：字体相对比较单一，都遵守方形折叠，务求填满的原则，有点类似汉文的九叠篆字，看上去显得大方庄重。其印文字体有时视印文内容多寡而定，当印文内容较多时，字体自然偏小，并且显得又扁又平；当印文内容少时，则相对灵活。（2）字数：印文字数也是视内容而定，字数从一个到三十余字不等。关于印面字数，还有这样一种有趣的现象，当印文的字数是奇数或字数多少不等时，造成印面文字不易排列，制印者便在印面每行文字的起首或末尾处增加符号来填充，目的是求得在方正的印面内印文对称、整齐，布局疏密有致、舒展美观。（3）字文：首先，按照印文内容，可以大致将其印文结构概括为四种组合方式：一是印章所有者的名字或爵职称号与吉语的组合。一般来说，这类印章印文的前半部分是选取朝廷封号与敕印文字的内容，常见的如“某某呼图克图”“某某额尔德尼诺门罕”“持金刚达赖喇嘛之印”，有时在名号之前加上“奉天承运文殊菩萨大皇帝”“皇帝谕旨弘扬佛教”“弘扬黄帽教法”“阐扬佛教”等前缀；后半部分的吉语多是表示祈福和祝愿的套用句式，如“全胜”“圆满”和“吉祥”等，这种组合方式最为常见。二是印章持有者姓名和吉语组合，如“颇罗台吉索南达杰之印诸事成功”“岱青巴图尔之印吉祥”。三是地名或人名，如“类乌齐”“协噶”等印。四是仅是吉语，如“幸福”“扎西”等印。其次，是吉语在八思巴字印章中的普遍使用。从前文可知，多数印都是以吉语结尾，用以表达某种祝福与愿望。这种现象在清代西藏地方使用的其他印章中是很少见的。最后，印文刻写不规范或刻写错误现象十分普遍。如对“诺门罕”“印章”“呼图克图”“国师”等词语的转写，可谓五花八门，没有规范标准。（4）印色：从印文颜色看，钤盖八思巴字印章时所选用的印泥颜色也有一定的讲究，其印色分黑、红、紫三种。一般来说，红色较黑色为贵，例如清初固始汗和第巴共同钤盖印章时，以固始汗红色印章为贵，第巴黑色印文为副署印<sup>77</sup>。同一枚印章，使用场

77 རྗེ་ཐུག་ལེན་པ་དབང་འདུས་ཚེ་རིང་། དེབ་ཟེར་ལོང་བའི་དམིགས་བྱ་དང་ཐམ་དེབ། ཚབ་སྤེལ་ཚེ་བཟན་ལུན་ཚོགས། བོད་ཀྱི་གལ་ཆའི་ལོ་རྒྱུས་ཡིག་ཆ་བདམས་བསྐྱེད། 1991: 8.

合不同，所用颜色也会有所不同，如“颇罗台吉索南达杰之印诸事成功”，从现存档案来看，既有红色，又有黑色印文。上级对下级和寺院僧人都用红色印泥，而下级对上级和僧官多用黑色印泥。紫色印只出现在一些特定历史时期，如在藏历土狗年（1658年）第司索南群培病逝，铁鼠年（1660年）赤列嘉措任第司之前，大约有三年时间由达赖喇嘛亲自署理政教事务，甘丹颇章地方政府把官方用印以朱红和黑色混合成紫色，钤盖于公文之上，据说此系旧任第司死后，新任第司还未产生之前时由达赖喇嘛亲理行政之时才会使用的印色<sup>78</sup>，目前尚未见到钤盖紫色印文的档案。

第五，印面装饰富有藏族文化特点，最常见的装饰有三种形式，即日月组合标识、由三个小圆点排成的“品”字造型及其他装饰。前两种装饰有一些共性特点：首先，这两种装饰都具有很强的实用功能，最直接的用途便是用来指示印章的上下顺序，以确定印章的正方向，不至于在加盖印章时将印文颠倒。其次，这两种装饰还可用来区分印主的不同身份。道理很简单，因为西藏的很多印章是可以先后承袭使用的，继任者为了区分与前任的印章使用身份，多会在原印上增刻日月组合或三个小圆点，有时也会刻一个藏文字母代替<sup>79</sup>。最后，这两类装饰可能都被赋予了一定的宗教意义。日月组合在藏文化中很普遍，在清代有说法认为它们分别代表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而三个小圆点，则象征佛教的佛法僧三宝。其他装饰，一般会选缠枝、莲枝、火焰等具有宗教意蕴的装饰元素。

#### 四、八思巴字印章的使用特点

据笔者粗略统计，在西藏现存的大量清代藏文档案中，以八思巴字印章的使用比例为最高<sup>80</sup>。本文在对大量藏文档案综合分析的基础上，将清朝西藏地方八思巴字印章的使用特点归纳如下：

第一，八思巴字印章的使用群体，基本涵盖了西藏地方上的所有政教首领，包括宗教首领、蒙古汗王、第巴摄政和护法神等。从现存文物资料可知，这些印章使用者往往不止拥有一枚八思巴字印章，而是有多枚，如颇罗鼐至少有三枚内容基本相同的八思巴字印章。此外，这些印章可以被承袭使用。最具代表性的世袭印章是达赖喇嘛的“持金

78 诺杰朗巴·旺堆次仁著，刘立千译：《噶厦印谱译注》，《中国藏学》1990（1）：89。

79 陈金钟：《西藏第司历任世系之印》，《西藏研究》1995（1）：124。

80 目前笔者所见约有五千件清代藏文档案，其中80%以上使用的都是八思巴字印章。参见朱德涛：《清代西藏官印制度研究》，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9。

刚之印”，该印原型本是明末蒙古俺答汗封授给第三世达赖喇嘛的印章，后来经过复制和仿制，被历辈达赖喇嘛所共用。再如据文献记载，达察活佛代理摄政在没收到朝廷封印以前，所用印信均系承袭上辈达察活佛的八思巴字摄政印<sup>81</sup>。同时，从前文还可知道，同一枚印章在被承袭使用过程中，承袭者为了标示与前任的区别，常会在前任印章的印面上方加刻一个由三个小圆圈组成的“品”字符号或日月标识<sup>82</sup>。第二，八思巴字印章既可以作为押题印，也可作为正题印。当印章加盖在公文起首语的位置，与清廷颁授的多语合璧官印一同使用时，属于押题印；当八思巴字印章被加盖在文告末尾，单独使用时，则属于正题印。从现存的档案看，八思巴字印章作为押题印单独使用的情况更为常见。

第三，相对于朝廷封印<sup>83</sup>，八思巴字印章的使用范围较小，印章所加盖的文告级别也相对较低。其使用范围主要集中在西藏本土，以及西藏东部和云南中甸等地区，所涉内容一般都是土地、田产、房屋税收的征免，或是个人、寺院特权的赋予或重申，一般不会涉及到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之间的政教大事。第四，钤盖汉字官印文告的材质一般都是米黄色藏纸，文告尺寸长度多不超过 80 厘米，宽度多在 35 至 50 厘米之间。

第五，一般情况下，政府文告如果钤盖了朝廷的封印，文告的起首称谓语中则会强调文告发布者是受到皇帝授权，即该文告的发布权力来自清朝皇帝。如 1734 年颇罗鼐发给西藏的文告，使用朝廷封印，其起首语为“天命文殊皇帝敕封人王贝子之文告”。再如 1735 年颇罗鼐发布的另外一件使用朝廷封印的文告，起首语谓：“奉文殊怙主大皇帝之命……大皇帝敕封台吉、贝子、贝勒人王多罗贝勒”<sup>84</sup>。当政府公文以八思巴字印作为正题印时，其起首语称谓中没有文告发布者权力来自清朝皇帝的表述，文告发布者在起首语中会直接呼吁辖内的所有百姓，常见的模式如：“天下所领所有众生，尤其是某地区辖内的所有贵贱人等周知”<sup>85</sup>，或者“晓谕天下管辖范围内的所有百姓，尤其是布达拉所属的执事、哲林、谿堆、米本、如本、达都、居本、文武官员所领之贵贱僧俗等一体周知。”在清朝早期，有的印章因为是达赖喇嘛封授，起首语中则会强调文告发布者的权力是来自达赖喇嘛，例如 1685 年达赖汗使用五世达赖喇嘛所授八思巴字印章发布的文告中，文告起首语为“达赖喇嘛敕封政教二道之践行者授权丹增达赖汗之文告”。<sup>86</sup>

81 诺杰朗巴·旺堆次仁著，刘立千译：《噶厦印谱译注》，《中国藏学》1990（1）：93。

82 陈金钟：《西藏第司历任世系之印》，《西藏研究》1995（1）：124。

83 朱德涛：《清代西藏官印制度研究》，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9：239-276。

84 这两件档案都收藏在西藏自治区博物馆。

85 Peter Schwieger, *The Dalai Lama and the Emperor of China: A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Tibetan Institution of Reincarna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5: 137.

86 功德林寺档案，编号 K2091。

## 五、清代八思巴字印章来源及出现原因探析

关于清代西藏八思巴字印章的来源问题，以往学者们要么避而未谈，直接忽略了这一学术问题，要么笼统认为这类印章是来自清朝中央政府的颁授<sup>87</sup>。通过对八思巴字印章的系统考察，笔者认为，清朝西藏地方政府公文中使用的八思巴字印章都不属于中央政府的官赐印信体系，而是来自西藏地方的自制印。根据清朝官方印章规制，清朝的官印分为中央铸造和地方制作两个层级<sup>88</sup>，西藏官方所用的印章也可因此分作中央颁赐和地方制作两大体系。据文献记载，清廷颁授给西藏的印章“喇嘛、呼图克图，或金质，或银印，扎萨克大喇嘛，铜质，并云纽，用清文、蒙古、唐古忒三体字，不篆，或清、汉文转宿篆”<sup>89</sup>，“印文清、汉本字镌于印背，年、月、号数镌于印旁”<sup>90</sup>。从现存印章实物和档案看，有清一代，清廷颁授给西藏地方的印章普遍是由满、蒙古、藏、汉等多语种文字组合而成的多语合璧印章，除金印和玉印外，一般都有满汉双语款识，这两方面特征应是清廷给西藏的官赐封印最重要的判断准则。

我们还可以从藏文文献和档案的角度，对清代八思巴字印章在西藏地方上的制作问题进行探讨。据《噶厦印谱》记载，藏历木鼠年（1804年），第八辈达赖喇嘛绛白嘉措圆寂后，“皇帝下诏令济仲呼图克图萨玛第巴克什任总管，办理政教事务。其所用印即火兔年收存在甲康内的大银印。木牛年（1805年）皇帝又下诏命将此印转赐与达察摄政。因此本年便新制一颗六行八思巴字的摄政大方印供其使用。至于前七辈达赖喇嘛赐与上辈达察私人继承使用之七行八思巴字摄政之印，即从铁猪年到本年在公文上加盖之印，已交内库储存。当时又另仿制一颗新印，交其私自使用”<sup>91</sup>。在这一段简短的记录中，就两次提到噶厦政府私制印章之事，可想当时西藏地方私制印的盛行。

此外，在功德林寺档案中，保存有一份印章制作的流程图谱和支出记录<sup>92</sup>，为我们窥探当时印章制作问题提供了珍贵的档案（图三、图四）。该档案由四张纸片组成，记录

87 陈金钟：《元以来中央政府颁授西藏地方首领印章举要》，《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8（3）：14-22。陈金钟：《西藏的吉语印章》，《中国民俗》1995（3）：15-17。陈金钟：《西藏第司历任世系之印》，《西藏研究》1995（1）：117-126。邹西成：《中国西藏文化博物馆展品中的三枚清代摄政王印章初考》，《中国藏学》2010（3）：106-1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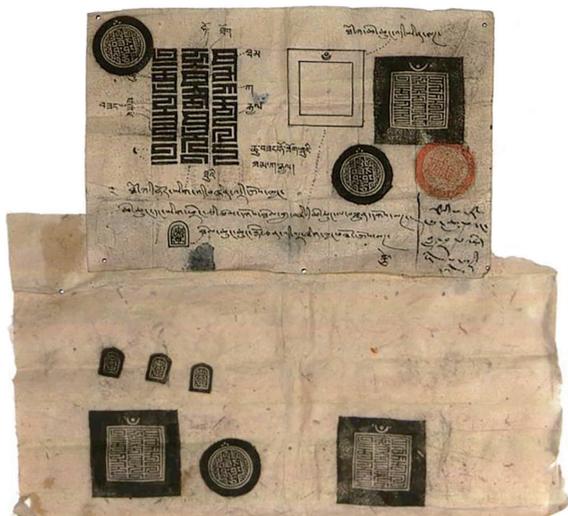
88 任万平：《清代官印制度研究综论》，载朱诚如、王天有主编：《明清论丛》第一辑，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9：298-316。

89 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志八十九》卷一一四，北京：中华书局，1996：32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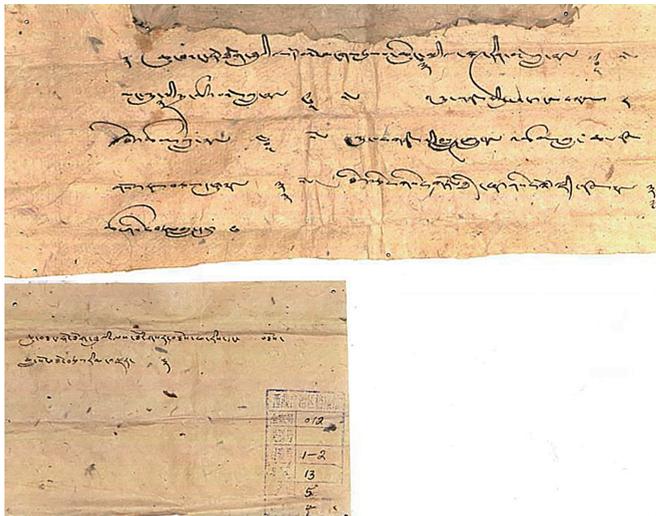
90 任万平：《清代官印制度研究综论》，载朱诚如、王天有主编：《明清论丛》第一辑，1999：298-316。

91 诺杰朗巴·旺堆次仁著，刘立千译：《噶厦印谱译注》，《中国藏学》1990（1）：93。

92 现藏于西藏自治区档案馆，档案图片采自德国波恩大学西藏档案资料数字化网站。



图三 新制却藏呼图克图印章流程图谱



图四 新制却藏呼图克图印章支出记录

的是一枚八思巴字印章、一枚藏文圆形印和一枚佛龕形符号印的设计方案与制作流程。第一张纸是档案的标题，由乌梅体藏文书写，内容为 **མུ་བཟང་ཉོ་ཐོག་ཐུང་ལས་ཐམ་གསར་བཅོས་ཁ་** **རིས་དང་བཅོས་སྒྲ་སོང་ཐོ་བཅས་རིམ་མཛད།**（新制却藏呼图克图印章支出记录）；第二张纸，既有印章流程图谱，又有藏文文字描述。在图谱中间靠左侧，画的是三行八思巴字文字，内容为 **མུ་བཟང་ཉོ་ཐོག་ཐུང་ཐམ་ཀ་རྒྱལ།**（却藏呼图克图之印胜利），在八思巴字的周围都有对应的乌竖体藏文单词，意思与印文相同。在这三行八思巴字的右侧，是一个没有刻印文的印面，由一大一小两个正方形组成，在上方有日月组合标识。在它的上下两侧有相应的藏文解说，上方内容为：**ཐམ་ཀ་ཆེ་ཆུང་འདི་ཡིན་ལགས།**（印章大小像这样），下方内容为：**ཉལ་ཀ་འདི་ཉོ་ཐོག་ཐུང་ལས་ཐམ་གསར་བཅོས་ཁ་རིས་དང་བཅོས་སྒྲ་སོང་ཐོ་བཅས་རིམ་མཛད།**（这种八思巴字印章，其大小、字行、形状尺寸和所需费用）。再右侧是将前面两部分合成的完整印面。在左上方和右下方，共有三枚相同的圆形藏文印文，其中两枚印文为黑色，一枚为红色，印面正中镌刻四行乌竖体藏文，内容为 **མུ་བཟང་ཐུང་ཆེ**（却藏拉章孜），印文两侧刻有装饰纹样，在藏文上方，印面的外延有一个由三个圆点组成的“品”字型标记。在左下方，有一个佛龕形的符号印文，印面中间画的是一个金刚杵，有对应的藏文，内容为 **ཐུང་ཆུང་ཆུང་རྩོ་རྩོ་ཐམ་འདི་འདྲ་ཞིག་ཀྱང་བཅོ་ཀྱང་བཅོ་ཐོག་ཐུང་ལགས།**（再制作一个像这样刻有金刚杵的小印）；第三部分是上述三方印章的完整印文，其中同一枚金刚杵符号有三处、八思巴字印两处，藏文印章的印文一次；第四张纸是关于制作这些印

章所需铁、铜和金等材料的支出记录，因其藏文字体太过潦草，无法完整辨识和翻译，仅能释读出制作这些印章需要铜、铁、金等金属材料，还需支付印章制作工匠工钱等零散信息。

这件印章制作图谱档案，为我们探究西藏地方自制印的制作程序提供了非常宝贵的信息。从该图谱内容我们可以看出，西藏地方的制印机构在为却藏呼图克图制作印章时，同时制作了三种不同类型的印章，既有印面内容为八思巴字和藏文的文字印，又有印面刻制金刚杵类佛教元素的符号印，这与西藏地方上现今存世的丰富的印章类型的情况正相一致。此外，西藏地方上的制印机构在制作印章时，也有一套制作流程，他们在印章正式制作以前，就已设计好了印章的具体信息，包括印面的语种文字、印章的大小尺寸、印文的行距规范和印面装饰等，在刻制过程中需要依照事先设计好的图谱进行操作，这种做法既能保证印章制作的成功率和制作效率，避免因操作失误造成资源浪费；同时也表明，在西藏地方上具有较为成熟的印章制作工匠和比较规范的管理机制。

如前所述，若论八思巴字印章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明末俺答汗颁给第三世达赖喇嘛的八思巴字金印<sup>93</sup>。但第三世达赖喇嘛在明末获赐八思巴字印章以后，这种文字并未立刻在西藏地方上流行开来。从现存资料可知，第五世达赖喇嘛颁授给固始汗的印章是藏文印章，并不是八思巴字印<sup>94</sup>；另外，五世达赖喇嘛在政教事务中使用频率最高的印章，是一枚依照清廷封赐的多语合璧金印自制的“自在佛”汉字印，清初的历任第司所用印信也主要是明朝遗存的汉字旧印，也不是八思巴字印<sup>95</sup>。上述现象都表明，八思巴字在清初西藏的使用频率并不高。从目前掌握的材料来看，清代八思巴印章最早出现在第五世达赖喇嘛颁授给蒙古各部落首领的印章之中，而西藏地方政府官员大量使用八思巴字印章的时间则稍晚一些，大略到了藏王颇罗鼐掌政前后，即十八世纪二、三十年代才普遍盛行。

清代西藏私制印的文字为何选用八思巴字，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虽然未见文献有明确记载，但可根据相关线索进行以下推测。

第一，与清朝官印制度以及朝廷对待西藏用印规制的官方态度有关。一方面，按照清廷的印章规制，西藏官方所用印章可分成中央颁赐和地方制作两大体系，这是西藏地方上可以大量自制官印的前提条件。另一方面，从文献记载来看，清朝前期，清廷对西

93 五世达赖喇嘛著，陈庆英、马连龙译：《一世——四世达赖喇嘛传》，2006：241。

94 乌云毕力格、道帷·才让加：《〈铁龙年顾实汗颁给达普寺的铁券文书〉考释》，《藏学学刊》第10辑，2014：175-185。

95 朱德涛：《清朝前期西藏所用汉字官印及相关问题探析》，《青海民族大学学报》2020（3）：20-28。

藏地方印章的使用规制及其自制印章的文字没有明确规定，但清朝中期以后，清廷将西藏流行的八思巴字印章的使用规范纳入了朝廷印制管理体系的范围之内<sup>96</sup>。表明清廷默许和承认了这一具有西藏地方本土特色的用印文化，这是从官方的立场肯定了八思巴字印章的政治合法性，必然会在很大程度上延续和助推八思巴字的使用范围。第二，出于现实适用性和政治合法性的双重需要。清朝早期，西藏地方的甘丹颇章政权是由蒙古和硕特部汗王和格鲁派高僧联合建立并统一管领的政权组织。从前文可知，清朝西藏地方使用的八思巴字是一种经由元朝八思巴字改造而来的文字，其外观形式与篆体藏文和中原内地官印通行使用的叠篆体汉字都有极大相似性。因此，选用这种类似篆体藏文的文字，一方面，从适用性的角度，无论是西藏地方上层的僧俗首领、蒙古贵族，还是青藏高原的普通民众都能易于识别和接受；另一方面，从政治权威性的角度，还可映射出这类自制印章在视觉效果上与朝廷封印具有同等效用的政治目的。第三，是遵循中央王朝与西藏地方政治历史关系传统的体现。在清朝以前，明朝蒙古俺答汗最早颁赐给第三世达赖喇嘛的印章所刻印文便是这种八思巴字，虽然中原明清王朝经历更替，但西藏地方上的政治传统并未中断，一方面表现在清朝初期，清廷对明朝敕封西藏的印信封号予以续封与改授；另一方面，以达赖喇嘛为首的政教首领在清朝前期所用印章基本上都是前朝旧印，甚至俺答汗颁赐的八思巴字印在西藏地方上一一直延续使用到清朝末年，表明西藏地方上一一直恪守着中央与地方的政治隶属传统。第四，受到西藏地方官员历史怀旧情绪的影响。在清朝的藏文文献中统称这种文字为“霍尔依”，意为“蒙古字”，它与元朝萨迦派国师八思巴创制的文字一脉相承，寄托着藏族人的民族情感和对元朝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政治关系的怀旧情绪。有迹象表明，清朝的许多藏族人有意识试图将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关系恢复到元代八思巴和忽必烈之间建立起的那种关系。例如当清朝将五世达赖喇嘛的金印磨损颁赐给六世达赖喇嘛后，藏地官员因对印章尺寸和体量不满，曾一度扬言拒绝使用清廷封印，而重新启用元朝颁赐给西藏的国师印<sup>97</sup>。

## 六、小结

综上所述，关于清朝西藏的八思巴字印章，我们可得出以下三点认识：

96 诺杰朗巴·旺堆次仁著，刘立千译：《噶厦印谱译注》，《中国藏学》1990（1）：94。

97 西藏自治区档案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等合编：《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1677、1697。季永海、李盼胜、谢志宁等译编：《年羹尧满汉奏折译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5：7。

第一,本文所讨论的八思巴字,是指自明朝末期开始在我国藏传佛教地区流行,主要是以八思巴字体式译写藏文的一种有别于元代八思巴字的文字类型,这种文字在清代藏文文献中被称作“霍尔依”,它最主要的用途是被用作刻制印章。八思巴字印章是清朝西藏地方上自行制作的一种官印类型,它被西藏的僧俗人员广泛使用于西藏地方的政教事务之中,它的印文形式和形制特点都与朝廷的官赐封印有显著的区别。

第二,八思巴字印章的使用群体基本涵盖了西藏地方上的所有政教首领,包括僧侣首领、蒙古汗王、第巴摄政和护法神等。从目前掌握材料来看,清朝的八思巴字印章最早出现在第五世达赖喇嘛颁授给蒙古各部落首领的印章之中,而西藏地方政府官员大量使用八思巴字印章的时间则要晚至十八世纪二三十年代。作为西藏地方上的自制官印,八思巴字印章在使用过程中既可以作为押题印,也可以作为正题印,并且它在使用对象、钤盖载体和文告起首语称谓等方面都与朝廷封印的使用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更多体现出较为浓厚的地方性特点。

第三,八思巴字印章在清代西藏普遍盛行的原因是由多方因素造成的。首先,从清朝印章制度的角度,朝廷将印章制作权部分下放至地方是西藏可以大量制作八思巴印章的前提条件。此外,清廷从早期的默认支持到后来将八思巴字印章的使用规范纳入朝廷印制管理体系的官方态度,为八思巴字印章在西藏的盛行提供了政治支撑。其次,使用八思巴字印章,既能同时兼顾蒙藏上层首领和一般民众的认可与接受心理,又能提升这类自制印章的合法性与权威性。再者,清代的八思巴字是经由元代八思巴字改造而来的文字,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和文化内涵,使用这种文字是西藏地方遵循元代以来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治历史传统的体现。最后,从藏族人对这种文字的称谓及当时的一些历史事件可以看出,西藏地方上使用八思巴字与部分藏族人对过去历史传统的怀旧情绪有一定关系。总之,本文对上述问题的探讨将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 and 认识清代西藏地方上的官印制度及其政治特点,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研究意义。

◆ 朱德涛 四川警察学院副教授